



作家孔见。

# 把这条「鱼」放回他的时代

孔见谈《苏东坡时代》：

海南日报记者 杨道

## 希望还原东坡活生生的状态

海南日报记者(以下简称记者):您写作《苏东坡时代》的初衷?

孔见:史学家陈寅恪说:华夏民族之文化,历数千载之演进,造极于赵宋之世。但今天人们谈论这个时代的文化时,说得最多是诗词、书画、陶瓷、茶道、歌伎,清明上河图里描绘的繁荣的市井生活,以及国家军事上的软弱,等等,很少涉及它在中国历史文化进程中的地位,特别是这个时代的士大夫精神。

6月29日上午,由海南省作家协会、海南省出版发行集团、外文出版社主办的“苏东坡与儒家王朝的士大夫——《苏东坡时代》海南首发式暨研讨会”在海口举行。参与者众,反响热烈。

《苏东坡时代》沿着苏东坡错落的脚印,以其跌宕起伏的人生为线索,将这个时代的人物与事件串联起来。该书作者孔见力图通过苏东坡、欧阳修、王安石、司马光等历史人物的行迹和思想,从不同角度潜入北宋王朝,呈现“横看成岭侧成峰”的视野,从政治、经济、艺术、人性等层面对其进行解读。

从2020年11月至今,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,孔见接连出版了《海南岛传》和《苏东坡时代》两大部头的书,两部书甫一出版,都引发了巨大关注。文艺评论家马良说,如果《海南岛传》初步显示了孔见的文史功力,那么《苏东坡时代》就是他这方面抱负与才华的一次大爆发。

6月29日,海南日报记者就此专访了孔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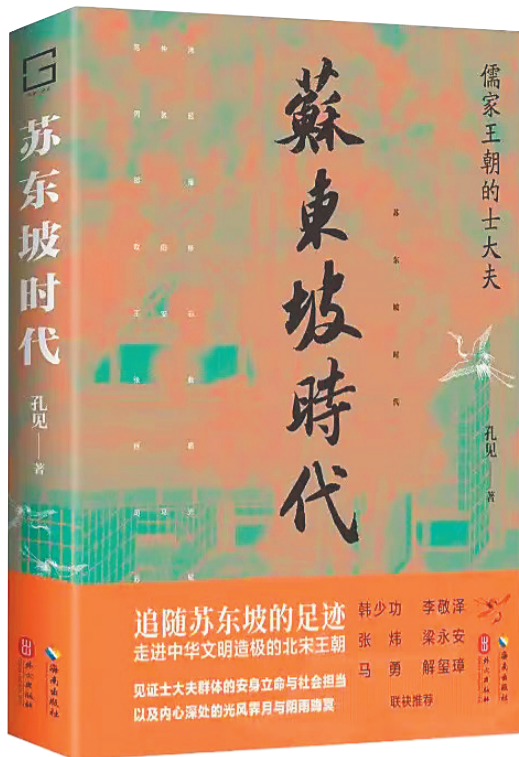
东坡像。手绘/杨千懿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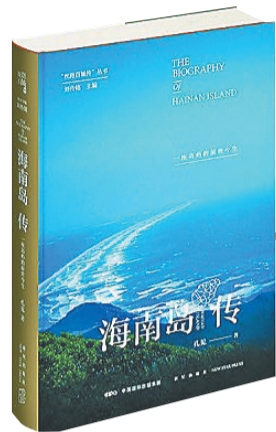
北宋之所以成为中华古典文明的黄金时代,是因为在这个王朝,儒家仁政王道思想成了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;中华文化的三大主脉(儒道释)实现了融会贯通,形成三江合流的波澜壮阔的局面;大量的读书人通过科举,穿越社会阶层壁垒,获得了进入权力体系的机会,与皇家共治天下,使得整个社会生活呈现出繁盛的人文性。这是古代中国人活得最有尊严与品位的时代,也是周朝衰亡之后政治最清明与承平的时期,制度文明与生活文明最高的时代。写作《苏东坡时代》,是想唤醒人们对这个黄金时代的记忆,激活民族文化的隐性基因。让人们重新认识我们民族文化传统的价值所在,在某种程度上消除积淀已久的曲解与误会,重建文化自信。

记者:有关苏东坡的书籍已经出版了很多,您写《苏东坡时代》是否会面临压力?

孔见:四年前,确认《苏东坡时代》这个选题时,读书界的东坡热似乎还没兴起,但现在已经呈现一种鼎沸的状态,好像这部书是为了蹭热度而仓促炮制出来的。其实这本书的写作可谓谋划已久。苏东坡的传记,最有影响的当数林语堂的《苏东坡传》,和台湾李一冰的



《苏东坡时代》书影。



《海南岛传》书影。

《苏东坡新传》。前者有较高的文化站位,但限于当时海外的写作条件,史料不够充分,写得粗疏和笼统一些,对于人物的评价也不够全面与公允。在溢美东坡的同时,给与他有冲突的人物抹黑。后者的写作占有资料较为丰富,对东坡人生历程的叙述相当细致,但该书平均用力,缺少对重要事件和情节的展开,也缺少对时代精神的整体把握。读了这两本书后,总觉得意犹未尽,于是就萌生了撰写一本新的苏东坡传的冲动。希望把苏东坡这条“鱼”放回他所处的时代,还原其活生生的状态和更为深邃的人格内涵。

## 东坡用生命度量社会截面

记者:为何选择通过苏东坡来走进北宋时代?他身上有哪些特质吸引了您?

孔见:文化的意义,不仅在于提供客观知识的源泉,更在于哺育与成就人格,让人活得更加开阔、通达与深邃,让人在更完满的意义上成其为人。回望中华文化史的天空,可以说是星斗璀璨。苏东坡的人生跨度甚大,不论是志得意满,还是落魄江湖;不论是悲欢离合,还是进退沉浮;不论是位高权重,还是身陷牢牢;不论是利害得失,还是生杀予夺,他都亲临其境,像神农尝百草一样,遍尝人间的种种况味。从庙堂之高,到江湖之远,一个完整的社会截面,他都用人肉生命一寸寸地度量过。而且,由于他的学养涵盖儒道佛三种文化资源,因此能够从容应对命运的种种变故,消化难以吞咽的人生经验。他的一生数起数落,被放逐的时间加起来长达十几年之久。在流贬与放逐中,他的身世一再被连根拔起,抛弃到荒凉之地,但他仍然能够全然地收容自己,安放好自己的身家性命,于无依无傍中站起来,义无反顾地承担自己的命运,以一颗大开大合的心,和光同尘,吞吐吐雾,与天地精神相往来,在杖藜茅舍之间活出一番风云气象来,完成了自我的涅槃重生,同时也完成了对中华文化人格的重新定义。即便到了天涯海角,也依然海阔天空,身穷心不穷,不至于陷入进退失据、运转不开要去撞南墙的死局。

在苏东坡身上,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华文化人格的魅力,理解其中蕴含的人文精神。在物质力量甚嚣尘上、有着压倒性优势的今日,安身立命的课题,非但没有得到解决,反而变得更加严峻,作践、辱没与

抛弃生命现象随处可见,我们更需要从苏东坡等人的身上,汲取内化于人格中的力量与智慧。

## 东坡是士大夫精神的典型代表

记者:您能否谈谈中国士大夫精神对于当代社会的意义?

孔见:在古代,士人主要是指读书人、知识分子;大夫是指在官僚体制里有一定地位的人。所谓士大夫,其实就是通过读书进入国家治理体系的知识精英,他们身上体现着知识与权力的结合。宋朝自开国皇帝起,就树立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理念,通过学而优则仕的科举考试选拔官员。进入国家权力体系的人,不是因为出身豪门望族,而是凭借知识的学习与积累。在唐代,科举录取的进士人数很少,整个唐朝进士人数仅有三万人,做官主要依靠门荫。宋朝总共有十万进士,士大夫人数规模很大,在社会政治文化中具有很大的影响力。因此,宋朝是士大夫精神最为光大的时代,而苏东坡堪称这个群体的典型代表。《苏东坡时代》的写作,又由一个人带出一个群体。它于是有了一个副标题:儒家王朝的士大夫。大量的寒门士子,在十年寒窗之后通过科举考试一跃龙门,穿越阶层壁垒,进入国家权力体系。他们身上呆萌的书卷气、书生气,冲淡了官僚体制腐朽气息。

熟悉历史的人会感慨,北宋官场的廉洁程度,远高于其他王朝,其中除了官员俸禄较高的缘故,还有士大夫阶层整体的人格自律与道德洁癖。儒家主张修身为本,注重生命存在的位格,强调人性不能屈尊于物性之下,视人格操守重于肉体生命。竹子与莲花,是宋代士林的两种精神图腾。竹子是君子人格的象征:虚怀若谷,气节凌云;莲花则是圣人人格的隐喻:出淤泥而不染。在北宋的士林里,像范仲淹、周敦颐、王安石、司马光、程颢、赵抃这样的君子比比皆是,他们身上散发着人性的光辉,都是头戴光环的人物。他们的生命都是有品格的。在那个生命具格的年代,人们不仅爱惜自己的羽毛,同时更爱惜自己心灵的品质,不愿意泯灭自己身上的人性之光。每当写到这些士君子的时候,我的内心就有着深深的感慨。社会的文明程度不仅体现在人拥有多少身外之物,更体现在人以什么样的生命品质去消受这些事物。☐